

对于未曾经历过烽火岁月的后辈来说，那段历史因为这百日变得具体而鲜活。在采访中小笼表示，成人之后，自己逐渐懂得：蒙自是“小地方”，更是“大后方”。让闻一多先生“下不了楼”的，不只是心无旁骛的态度，更是一种家国同在的时代精神。这种精神，是一份足以跨越时空的力量。

那年，朱自清还在蒙自给清华毕业学子留下题词：“诸君又走了这么多的路，更多地认识了我们的内地，我们的农村，我们的国家。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，各尽所能，来报效我们的民族……”

令小笼觉得有意思的是，多年以后，和自己一样的数以千万计的小镇青年，朝着联大师生当年的“反方向”，走了很长的路，去到北上广深，削尖脑袋挤进大城市的写字楼。“当我们抬头低头皆是六便士之事，在精神疲乏时分，或许可以回头看看当年那些人走的方向呢？那个方向通向理想之路，可以抵抗微小、抵抗速朽、抵抗‘无意义’。”

大学生，“活在具体之中”

1942年，彼时已经从西南联大毕业的诗人穆旦作出人生重要决定——投笔从戎。他写下“我要赶到车站搭1940年的车开向最炽热的熔炉里”，以一种将学术与救国熔铸一体的情怀，造就了联大特有的精神气质。那些在油灯与警报器交替闪烁的夜晚，文明的火种在年轻人的言行中得以延续。

当下，年轻人们不再像当年的联大师生一般，面临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机考验，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看似拥有更多选择。然而，也有一部分网友提出，这一代年轻人，尤其“Z世代”缺少行动力，也缺乏足够明晰的人生目标，所谓“老年人生机勃勃，中年人焦头烂额，年轻人死气沉沉”。

今年正在上海某高校求学的研三学子张壮壮（化名），即将面临毕业之后的人生道路选择。作为“00后”，她对《新

民周刊》表示，不能片面地认为青年对整个时代的宏大关怀不够。“不同代际的青年，面临的时代问题不一样，导致表达方式也不同。在杨振宁、邓稼先和穆旦年轻时，他们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救国，所以很多人选择投身报国。如今的年轻人不再面临‘救国’这般沉重的话题，但仍然有人努力在实践中寻觅与时代的同频共振。”

对于这一点，许纪霖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，1985年以前出生的人，内心多少还是有些宏大关怀的，他们的兴趣点、关怀点，与一套宏大叙事连接在一起，譬如国家和世界。到了千禧一代和“Z世代”，“他们越来越注重具体的、当下的、和自身体验的生活有关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”。

之所以年轻人愈发“活在具体之中”，拥有更具体的意愿和诉求，在许纪霖看来，这是因为他们“不需要永恒，只需要瞬间的治愈，整个都是一个碎片化的生活，碎片化的生存”。如果外界还带有过往的认知框架和生活模式去想象，就没法理解年轻一代。

距今7年前，刚刚进入大学时，张壮壮向往的是毕业后进入大型互联网公司或者外企。如今研究生毕业季，她却在准备考公考编，同时准备报考学校的辅导员岗位。人生选择的转向，一切源于她的个人体验。“我之前去大厂实习过，发现自己不太适应那种高压快节奏的环境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本科毕业后参与学校的支教计划，去到西部地区支教一年，真真实实看到了中国最基层的样貌和孩子们的教育状况。那一年的经历对我触动很大。”

几年前，在张壮壮支教的西部农村，她曾遇到过一位不交作业的男生，而男生给出的无法完成作业的理由是“家里没有写字的桌子”。后来她去家访，发现男生没说谎，“他家里家具都很少，真的没有桌子。我和班主任家访完，共同出钱给他买了一张书桌”。如果不是亲眼见到，她也难以想象这些教育环境的具体差异。

一年的支教经历，切实地影响着张壮壮。回到上海后，她仍然觉得不够，希望未来能继续当老师，尝试去帮助更多学生。